

中 亚

论中亚宗教极端势力产生与发展的 社会经济与政治根源

苏畅

【内容提要】社会经济与政治根源是中亚宗教极端势力产生发展的重要因素。包括中亚国家独立后发生的经济危机、持续数年难以解决的贫困问题、教育体系受到严重冲击等社会经济因素，也有在现代化过程中政府治理的失误、宗教政策中存在的偏颇、腐败问题等国内政治根源，以及中亚各国独立后宗教激进主义的影响等思想意识根源。

【关键词】中亚 宗教极端势力 根源

【中图分类号】D73/77.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1094 (2012) 02-0044-0006

中亚宗教极端势力产生于苏联解体、中亚民族国家独立的新旧历史变化接合期，在这种历史大变迁的背景下，外力固然推动了中亚宗教极端势力的发展，但该地区存在的各种内部因素才是其催生、培育、激化的土壤。

一、社会经济根源

(一) 贫困问题

在众多社会经济因素中，贫困问题当属中亚宗教极端势力产生与发展的最重要原因。苏联解体后，中亚国家陷入了长达数年的经济危机，人民生活从安定、温饱跌至贫困，产生了大量贫困人口，相当多的人长期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与此同时，大量社会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贫富分化现象十分严重^①。

贫富分化成为社会矛盾的主要根源，贫困阶层由此对社会、政权产生不满，一些人甚至开始仇视政府，再加上受到宗教极端思想的鼓动，认为只有通过政治变革推翻现政权，建立伊斯兰政教合一的国家才能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

贫困阶层的主体是失业者、老年人、残疾人、多子女家庭、青年、学生和农民。独立后中亚国家农业人口流动困难，农村人口不断增加，缺地少地

① 当然，贫富分化问题不仅源于经济危机，还与经济转轨过程中产生的社会利益再分配、腐败现象等因素密切相关。哈萨克斯坦学者认为乌兹别克斯坦的贫困原因包括：人口因素，即高出生率；有限的土地资源和水资源；不利于中小企业发展的经济环境；工作岗位少。См.: Марина Пикулина, Узбекистан: причины бедности и возможные пути решения проблемы, Институт мировой экономики и политики при Фонде Первого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К, Проблемы борьбы с бедностью в странах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в условиях глобализации. Алматы, 2004г. С. 123.

【作者简介】苏畅，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副研究员。

【基金项目】2006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亚宗教极端势力研究》（项目批准号：06CGJ006）最终成果的一部分。

的问题十分普遍,一些地区的居民连温饱都难以达到,农民陷入生活困境。高失业问题在中亚各国普遍存在,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经济体制的转变使原有的隐性失业变成显性失业;二是苏联解体造成的经济联系中断,使许多企业停产或破产^①;三是农村人口向城市无序流动,城市无力安排;四是各国经济危机导致投资减少,新增工作岗位有限;五是一些国家进入劳动年龄的人口增加过快时期。失业大军的存在不仅影响失业者家庭的生活质量,也成为影响国家稳定的社会动因^②。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中亚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也在增加。哈萨克斯坦经济状况最好,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最差。2003年,塔吉克斯坦政府宣布,全国有80%的居民生活在贫困状态中,而其中又有30%处于“极度贫困”状态^③。2004年4月,在世界银行宣布的最贫穷国家中,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位列其中^④。中亚国家间的经济差距为该地区增加了不稳定因素,隐藏的一些社会与安全问题令人担忧。

贫困问题带来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大,社会矛盾不断尖锐化。人们一边忍受贫穷,一边由于逐渐了解其他国家的经济发达状况而对政府的抱怨越来越多,一些人对政府的仇视也在伴随着没有任何改变的贫困生活而增加。在许多落后地区,穆斯林对极端分子描述的“政教合一的幸福天堂”深信不疑,中亚的“圣战”口号中充斥着推翻卡里莫夫政权等内容,许多被吸纳到宗教极端组织的人,最淳朴的愿望仅仅是吃饱肚子、改变现状。生活困顿、人生经验又不丰富的年轻人在社会变革中尤其痛苦。中亚国家独立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是“迷惘的一代”,他们经历了苏联解体的历史巨变,要面对经济危机带来的生活困境、国家独立引发的民族主义高涨、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撞击。在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等每个生命个体所依托的生存条件发生颠覆性变化的年代,很多年轻人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发生混乱,加上无法受到系统教育和正确引导,宗教极端思想乘虚而入,“圣战”、“推翻现政权”、“政教合一”等思想很容易让年轻人接受,许多年轻人甚至认为加入宗教极端组织是爱国、对宗教虔诚的表现^⑤。加上生活贫困、前途未卜,失业的年轻人更容易受到宗教极端组织的吸引,从事极端活动^⑥。面对生存需要,穷困的年轻人出路并不多:

要么留在家乡忍受贫困,要么远赴俄罗斯打工赚钱,一些人选择了加入宗教极端组织,因为这样“可以迅速挣到更多的钱”。激进而贫穷的年轻人认为,以雇佣兵的形式为宗教极端组织“工作”,所得收入要“更稳定”一些,中亚的宗教极端组织仿效塔利班、“基地”组织等恐怖组织的模式,向成员按期支付报酬。有一些年轻人选择参加境外恐怖组织,谋求更高的“工资”。与此相关联,中亚宗教极端组织的成员呈现出低龄化特点。“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小头目朱洛耶夫被捕时年仅20岁,其同伙也都是年轻人。

教科文卫事业的萎缩也给了中亚宗教极端势力以可乘之机。受教育人数减少,教学质量下降,国民整体教育水平下滑,导致正规教育出现缺口,伊斯兰传统教育仍是许多农村儿童受教育的唯一途径。学生在宗教学校中可以免费学习,但他们的现代知识结构严重不完整,而且地下宗教学校是传播宗教极端思想的主要场所,极端组织经常利用宗教学校的便利条件向学生传播思想。很多境外的伊斯兰激进分子也在宗教学校“授课”,为学校提供教育经费,培育出大批新一代中亚本土宗教极端分子。这些宗教极端组织由于“资金援助”和“教育投入”得到许多村镇居民的拥戴。一些宗教学校更成为宗教极端组织的地下训练基地,对狂热青年进行爆炸、绑架、射击等技能培训。宗教学校还往往是人们发泄对政权不满的场所。在穆斯林从事宗教活动时,极端分子常常伺机煽动,引导老百姓对政府的不满。社会保障体系严重不健全,尤其是医疗服务水平全

① 在乌兹别克斯坦的一些工业较发达的城市,如安格连、契尔契克、别干巴德,由于一些大型企业和工厂停产,造成大批工人和技术人员失业,他们涌入大城市寻找工作,从而产生了“国内移民”问题。См.:Марина Пикулина Узбекистан:причины бедности и возможные пути решения проблемы,Институт мировой экономики и политики при Фонде Первого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К,Проблемы борьбы с бедностью в странах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в условиях глобализации.С.121.

② 赵常庆主编:《十年巨变:中亚和外高加索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209页。

③ Иброхим Усмонов, Опасности для внутренней стабильности Таджикистана,О совместимости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ислама 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в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 ОБСЕ,Душанбе 2003.С.189-200.

④ Ольга Кондрашова, Киргизия, Таджикистан и Узбекистан входят в группу беднейших стран мира, Новые известия(Россия),14.04.2004.

⑤ Иброхим Усмонов, Опасности для внутренней стабильности Таджикистана,О совместимости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ислама 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в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 ОБСЕ, С.189-200.

⑥ Ашимбаев М.С.: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Казахстана на современном этапе.Алматы:КИСИ2002.С.37.

面下降,疾病与失业、低工资、犯罪等社会问题结合在一起,很容易在中低收入人群中引发对政府的不满,也容易受到宗教极端思想的诱导,认为只有更换当前的政治制度、用伊斯兰教法治国才能解决一切民生问题。人们的文化生活变得单调枯燥,为宗教极端思想蔓延创造了条件。文化设施减少、票价上涨,让普通老百姓无法享受到高雅艺术。大量农村电影院关闭。许多图书馆由于经费紧张被关闭,图书价格猛增,人民群众不再是购书的主体。

总之,整个社会的经济危机、家庭收入大幅减少、生活质量严重下降,甚至失业、失学、疾病等问题,导致社会弱势群体丧失了许多权利,中亚居民对政府的不满不断增加。世界银行于2004年在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进行的调查显示,尽管中亚国家居民生活在改善,但显然还远远不够,在被询问的人中,有2/3或更多的人都表示对目前的经济状况不满,失业是人们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堆积起来的社会问题在短时间内无法解决,使宗教极端势力有机可乘,他们以社会问题为标靶攻击政府,向人们灌输“只有推翻世俗政权、建立政教合一的国家,才能解决一切问题”的极端思想。

(二) 费尔干纳问题

费尔干纳与中亚宗教极端势力的关系十分密切,不少专家认为费尔干纳谷地是中亚宗教极端势力的“发源地”,研究中亚宗教极端势力,就要搞清“费尔干纳因素”。费尔干纳的封闭与贫穷问题是中亚宗教极端势力产生的两大重要原因,特别是费尔干纳的封闭性,比贫困问题尤甚。谷地居民对外界了解的有限性、对外来文化的排斥以及交通不便给经济发展造成的障碍,都为伊斯兰激进思想的传播、为极端分子煽动诱导朴实的穆斯林为实现“在费尔干纳建立伊斯兰国”而向宗教极端主义靠近创造了有利条件。

费尔干纳谷地是中亚宗教极端分子的“家乡”、基地、活跃区,这里有深厚的极端势力基础,建立政教合一的“费尔干纳汗国”是所有中亚宗教极端分子的终极目标。还在苏联时期,费尔干纳的穆斯林就一直要求独立,谷地的一些大城市,如安集延、费尔干纳和纳曼干都有反苏武装。1917年底至1926年和1933年在这里发生了具有宗教极端主义性质的巴斯马奇反革命武装叛乱。苏联解体前,

这里已经形成了由地下经学院组织的宗教激进主义组织的网络,并与中东的一些极端组织建立往来。中亚国家独立前后,一些伊斯兰激进组织开始盘根费尔干纳,如正义党等数十个原教旨主义团体都在这里活动。费尔干纳谷地成为中亚宗教极端分子的“圣地”,“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在这里产生,伊斯兰解放党也活跃在这一地区。一些极端组织还以费尔干纳为大本营,传播极端思想,招募极端分子。在中亚宗教极端势力活动猖獗的1998~2000年间,费尔干纳一度成为宗教极端分子与政府军的“战场”。宗教极端组织的一些领导人的家乡都在费尔干纳。

费尔干纳地区的行政区划比较复杂,增加了中央政府的管理难度。谷地由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三国共有,领土相互镶嵌、犬牙交错,其中的三块飞地成为不法分子经常出没之地,三国对费尔干纳的管理执行力有限。而且谷地四面环山,易守难攻,如果恐怖分子藏身山区,政府军则很难清剿。谷地是中亚农业区,人口1000万左右,几乎占中亚五国人口总数的20%,是中亚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区。人口膨胀造成资源稀缺,农业用地紧张、失业率高,加重了该地区的贫困程度。三国交界的民族居住区经常因争夺土地、水源发生冲突,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性。谷地被群山环抱,出口少,交通十分不便。冬季还有数月大雪封山,公路运输便更加艰难。人们对外界的了解十分有限,大部分人没有出过谷地。历史上,费尔干纳的宗教阶层势力就非常强大,权力一度大于当地政权统治者。沙俄时期,费尔干纳的伊斯兰领袖是历次起义的领导者或积极参与者。在苏联反宗教宣传的70年间,地下阿訇在费尔干纳地区的活动从未停止过。清真寺数量、穆斯林的人数以及伊斯兰党派和组织的集中程度在中亚都是最突出的。费尔干纳人恪守伊斯兰传统习俗,有些地方还保留多妻制。除了伊斯兰文化,在费尔干纳几乎找不到其他文化。在这种封闭的社会状态中,人们在面对宗教极端分子的煽动时,很容易陷入人云亦云的错误认知之中。由于长期的宗教极端主义影响,费尔干纳的一些底层老百姓对这种激进思想持同情甚至支持态度。

如前所述,贫困成为滋养宗教极端主义的良好土壤,奥什、贾拉拉巴德、安集延、纳曼干等地居民的生活相当贫穷,年轻人的失业与贫困问题尤为

严重。“费尔干纳的大部分年轻人都处于失业状态，这些人甚至看不到能找到工作的希望。这便是滋长激进主义和犯罪的富饶土壤。”^①费尔干纳人口的一大特点是低龄化。由于出生率高，这里几乎半数人口的年龄低于16岁^②，他们很适合成为宗教极端势力煽动、吸收的对象。

二、国内政治根源

同世界其他地区一样，贫困是中亚宗教极端主义的重要根源。贫困带来的贫富分化以及高失业率、疾病等现象，都成为宗教极端势力的“良好肥料”。但是，贫困并不是宗教极端势力产生的全部原因，不是所有贫困地区都能产生宗教极端势力。中亚国家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出现的政府治理失误、宗教政策偏颇以及严重的腐败等问题是宗教极端势力产生的国内政治根源。

1. 中亚国家独立初期伊斯兰教开始全面复兴。中亚各国领导人为了巩固民族国家政权，并不反对伊斯兰教在国内的广泛传播，在一定条件下和一定范围内支持宗教活动。独立初期出现的众多宗教党派没有得到有效疏导和控制，加上政治局势比较混乱，间接推动了宗教极端势力的滋生。

2. 独立初期一些中亚国家选择西方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本国转轨的政策取向。这种忽视穆斯林社会特质、盲目植入具有与中亚穆斯林社会完全不同价值观的西方经济模式，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社会大变革之中迅速改变，变得冷漠、疏远，信任和友善在减少。这种改变让传统的穆斯林社会很难在短时间内接受，认为人们在失去信仰，“只有在伊斯兰里才能找到解决这一问题的答案”^③——急速向市场经济转型让人们开始怀念过去的道德观和价值观，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建立伊斯兰教法国家是最好的解决问题的途径。在这种情况下，宗教极端组织趁机向穷人提供经济资助，拉拢人心。

3. 中亚国家独立初期，宗教极端势力抬头，引起各国领导人警惕，中亚国家开始整治各类宗教组织，采取了一系列压制措施，甚至对穆斯林的宗教活动进行限制，引起穆斯林的强烈不满。个别中亚国家对反政府言论进行打压，把一些激进的、对政府不满的，或者与宗教极端分子有亲属关系的老百姓关进监狱，从而引发这一群体对政府的仇恨，

形成新的社会矛盾。由于过度打压，负面的社会舆论没有正常疏通的渠道，清真寺、宗教学校等伊斯兰教设施以及巴扎（集市）等成为激进的穆斯林发泄不满和交流信息的地方，从而为宗教极端势力“培育”出坚定的支持群体。

4. 严重的腐败降低了民众对政府的信任，腐败问题已成为宗教极端势力滋长的重要因素。根据“透明国际”《2005年清廉指数报告》，中亚国家的清廉程度普遍较低。腐败行为主要在政治、经济和财政预算领域。许多官员以权谋私，利用国家在经济转轨过程中经济制度尚未完善投机取巧，中饱私囊。执法机关的腐败现象也十分严重。官僚机构存在的严重腐败问题招致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法制的健全和严重的腐败往往导致在执法过程中出现一些有失公正或过严的现象，加深了社会矛盾，让穆斯林社会倾向选择伊斯兰教法作为法律依据，增加了民众与宗教极端思想的契合性。

三、思想意识根源

苏联解体后，中亚国家出现信仰真空，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给人们带来强烈的精神冲击，很多思想苦恼的人开始信仰宗教，以寻求精神寄托，伊斯兰教迅速复兴。“非传统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积极参与进来，与中亚原有的宗教极端思想合并，形成新的历史与政治条件下的宗教极端思想，引导一部分穆斯林接受宗教极端思想。事实上，中亚宗教极端思想并非在五国独立前后才产生。有中亚学者认为，苏联时期实行的“战斗无神论”政策^④是

① Эгамберди Кабулова, Ферганская долина: Бедность среди молодежи питает радикализм, <http://www.ferghana.ru/article.php?id=4971>, 12.03.2007.

② Рейнхард Крумм, Ввести предисловия, Институт мировой экономики и политики при Фонде Первого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К, Проблемы борьбы с бедностью в странах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в условиях глобализации. Алматы, 2004г. С9.

③ Косиченко А.Г. и т.д. Современный терроризм: взгляд из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Центр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и анализа Казахстана, Алматы, 2002. С140.

④ 20世纪20年代苏联成立了“战斗的无神论者同盟”群众性组织。这一组织1925年成立时叫“无神论者同盟”，1929年更名为“战斗的无神论者同盟”，到30年代初已有500多万名成员。其宗旨是对宗教这个社会主义建设和文化革命的障碍进行积极和系统的斗争，甚至提出了“同宗教作斗争就是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口号。当时还有一些极端的提法，如“宗教是旧时代的残余”，“宗教愚昧”，“铲除伊斯兰教”，“群众性的无神论”等，使苏联的宗教政策偏离了轨道，伤害了信教群众的宗教感情。引自常玲：《论中亚的伊斯兰教与地区稳定》，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论文，第14页。

促使中亚国家宗教极端主义产生的主要原因^①。当然,“战斗无神论”政策只是苏联时期对伊斯兰教进行压制的众多政策和手段之一。20世纪70年代,在苏联时期对伊斯兰教实行打压政策的情况下,中亚的一些高级宗教人士建立了一些地下宗教组织^②,这些组织成为“纯粹的”伊斯兰信徒的活动平台,试图通过暴力手段反抗苏联的统治,宗教极端思想逐渐形成。

在苏联解体前夕,中亚的宗教形势趋向“自由化”,伊斯兰教走出困境,出现了两种发展趋势:一种是广大穆斯林开始过上正常的宗教生活,合法地从事宗教仪式和遵循宗教传统;另一种是短期内出现了大量清真寺,狂热激进的原教旨主义分子开设宗教学校,出版极端思想的宣传品。独立初期伊斯兰复兴运动内部并不一致:中亚多数穆斯林属于温和的逊尼派,一部分人纯粹地追求伊斯兰思想,保留纯粹的宗教仪式;另一部分人的原教旨主义思想十分强烈,试图以伊斯兰法典为法律标准,建立伊斯兰国家。温和的穆斯林认为原教旨主义思想是“异端邪说”,是“不正确的”^③,原教旨主义分子对这些穆斯林进行了大量的宣传,许多人渐渐接受了原教旨主义思想,开始认为“原教旨主义思想是伊斯兰价值观的真正回归”。但是,“伊斯兰价值观”的回归并不能自动重建苏联之前的社会行为规则^④,对于世俗的政治精英来说,伊斯兰教的复兴与国家战略发展是尖锐矛盾。因此,伊斯兰教的复兴逐渐成为国家政权的对立面,并且随着复兴浪潮的高涨,宗教极端势力也演变为国家政权的敌对一方。

中亚的伊斯兰激进主义,包括伊斯兰复兴党等一些早期的宗教激进组织、瓦哈比分子的激进思想,无疑是宗教极端势力的重要思想根源之一,但伊斯兰激进主义与原教旨主义是有区别的。最初的原教旨主义只属于宗教学领域,是一种正本清源、返璞归真的宗教精神。但是,伴随着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发展,原教旨主义也越来越具有国际政治的性质,并逐渐演变出伊斯兰激进主义思想,即政治特征明显的、主张通过“圣战”等暴力方式建立伊斯兰政教合一国家的思想。

伊斯兰思想具有社团化的特点。所谓“伊斯兰思想的社团化”,是指群体的而非个人的思想,依托于一定的社团、派别、利益集团而得以体现的思

想。它适应一定的社团、派别、利益集团的需要,具有与之相应的载体或组织形式使之得以生存、延续和发展。伊斯兰思想社团化的主要表现形式有:以清真寺院为中心的社团化,以教团、行会为中心的社团化,以某种宗教—政治性小集团为中心的社团化^⑤。伊斯兰复兴党就属于伊斯兰社团化组织,它要求严格执行伊斯兰的原初教义。与瓦哈比派和原教旨主义思想有所差别的是,伊斯兰复兴党等宗教激进组织更加政治化,参政意图更加明显。认为必须建立一个符合伊斯兰教基本原则的社会制度。

宗教极端思想是伊斯兰思想的物质化产物。伊斯兰思想的物质化是通过穆斯林的社会活动、社会实践予以体现的^⑥。如清真寺是伊斯兰思想物化的一种象征;由于教派思想的矛盾和对立而造成的隔阂、敌视、冲突和对抗,也是物质化的一种体现。这种物质化有时具有积极意义。但是伊斯兰复兴党、正义党等宗教—政治性小集团运用这些对社会具有政治企图的思想 and 主张,鼓动激进的穆斯林从事极端主义运动,并且随着时间和环境的变化,新的外部或内部的宗教极端势力参与进来,逐渐演变为中亚宗教极端势力,是伊斯兰思想物质化步入歧途的一种表现。

有学者认为,中亚的原教旨主义运动是一种特殊的瓦哈比主义,或政治伊斯兰教^⑦。的确,这种瓦哈比主义的“特殊性”在于,当代中亚瓦哈比分子的主张有别于沙特阿拉伯奉为官方信仰的瓦哈比派教义。当代中亚瓦哈比分子在外界政治和宗教势力的影响下,打着宗教旗号愤世嫉俗地批判社会的不公和不义,主张通过圣战以武力推翻现政权,重新建立伊斯兰国家、伊斯兰社会。他们反对“异教徒”,反对一切被视为非伊斯兰或反伊斯兰的东西,极力主张通过圣战在中亚地区建立伊斯兰政权。然

① Егоров Ю. С мечтой о всемирном Халифате,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12 апреля 2001.

② Акимбеков С. Ислам и проблемы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Казахстан-Спектр, 2002, №3.

③ Мариан Абишева, Тимур Шаймергенов, Религиоз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экстремизм в странах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анализ причин 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ия,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и Кавказ, Швеция, 2006-6.

④ Акимбеков С. Ислам в Казахстане. Континент (Россия), 2001, №19.

⑤ 金宜久、吴云贵:《伊斯兰与国际热点》,东方出版社2002年版,第38~41页。

⑥ 同上,第41页。

⑦ Kulchik, Yuriy, Fadin, Andrey & Sergeev Victor, “Central Asia after the Empire, London: Pluto Press”, 1996. p.7.

而,虽然这些宗教极端分子的行为特征越来越背离伊斯兰教的本质,但他们却自认为是在“从事一项神圣的事业”。除去雇佣军,还有相当一部分极端分子抱有这种乌托邦式的理想情怀。宗教极端思想家们的蛊惑起了很大作用。伊斯兰解放党教徒从早到晚不断被灌输“要无条件完成安拉的任务”,“穆斯林没有义务为现政权工作”等主张^①。一般新教徒要接受六个月的“洗脑”课程。

从中亚伊斯兰教派的角度来看,一些穆斯林能够接受宗教极端思想是有原因的。中亚的逊尼派穆斯林遵从哈乃斐法学派,逊尼派在中亚五国穆斯林总人口中占90%以上^②。哈乃斐学派是四大法学派中比较宽容的派别,给予了中亚广大穆斯林宗教生活更多的自由,如对一些宗教禁忌要相对宽松。哈乃斐学派认为,如果一个穆斯林真诚地相信真主和使者,即使他忽视了宗教义务,他仍然不是异教徒^③。这种灵活的态度使中亚的伊斯兰教容易吸纳和融合其他文化习俗,但同时也容易受到宗教极端思想的侵蚀。此外,由于受其他文化的影响,如游牧民族的部落、部族文化的影响,加上苏联长期无神论教育,中亚的许多穆斯林对伊斯兰教知识的掌握和理解比较肤浅和直观,加上中亚官方伊斯兰精神的弱化,在独立初期民族主义高涨、“共产主义撤退”、外来宗教思想大举进入的大环境下,很容易被原教旨主义思想和激进主义思想所误导,进而成为宗教极端主义的追随者。

研究中亚宗教极端势力的社会与政治根源,对宗教本身的因素不能忽视。中亚地区拥有深厚的伊斯兰传统,伊斯兰教在中亚各民族的文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宗教极端分子对伊斯兰教义的激进曲解在民众中产生了影响,极端的政治势力借伊斯兰教的口号来争取支持,正是因为这一宗教在中亚国家社会生活中拥有独特的影响力。虽然贫困、教育、社会矛盾、腐败、政策缺失等问题是中亚宗教极端势力兴起的主要原因,并且伊斯兰极端组织也更多带有政治特征,但是,很多宗教极端主义的拥趸者确实是纯粹的狂热分子,把建立政教合一的国家当成终极理想。在费尔干纳谷地一些富庶而又封闭的地方,同样盛行宗教极端主义,这就不能把宗教极端主义产生的社会原因简单解释为贫困问题。虽然外部势力向中亚输出宗教激进主义和极端主义往往带有政治目的,但伊斯兰因素确实是中亚和伊斯兰国家的重要纽带,相同的信仰、相近的教派和教义拉近了这些国家的距离,无论是“输出”还是“接受”,都具有主观意愿作为基础。

(责任编辑 靳会新)

① Светлана Метелева: Спецкор “МК” провел полгода среди московских активистов организации “Хизб ут-Тахрир”, Московский комсомолец, <http://fergana.ru/detail.php?id=467265509018103>, 19.07.2004

② 王建平、吴云贵、李兴华:《当代中亚伊斯兰教及其与外界的联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报告,2000年7月。

③ Haghayeghr, Mehrdad: Islam and Politics in Central Asia, by N.Y.St. Martin's press, 1995, pp80-81. 转引自王建平、吴云贵、李兴华:《当代中亚伊斯兰教及其与外界的联系》。

On the Soci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Roots of the Religious Extremist Forces Arising and Developing in Central Asia

SU Chang

Abstract: Soci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origins are the important factors in the religious extremist forces arising and developing in Central Asia, including the economic crisis following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the poverty lasting for many years and hard to deal with, the education system seriously impacted and some other social and economic factors, also including the government faults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the bias in religious policy and the corruption issues, as well as the Islam fundamentalist influence and ideology.

Key words: Central Asia; religious extremist force; origin